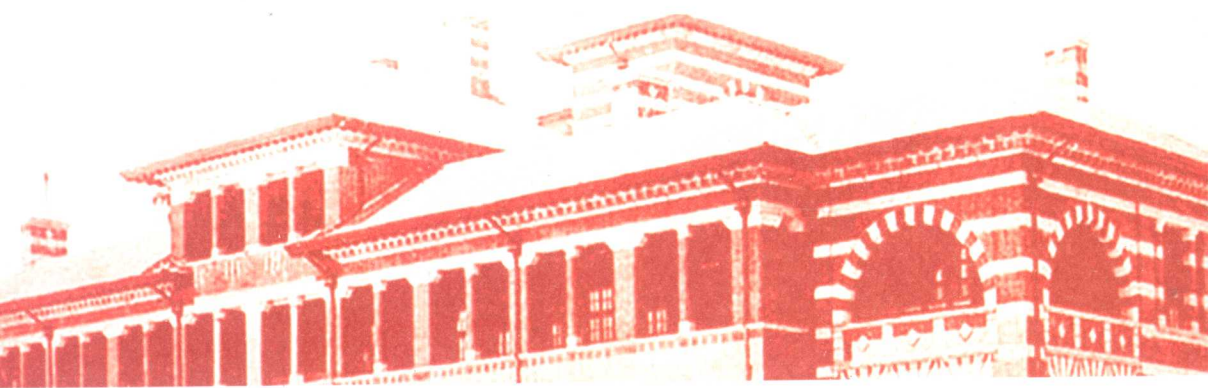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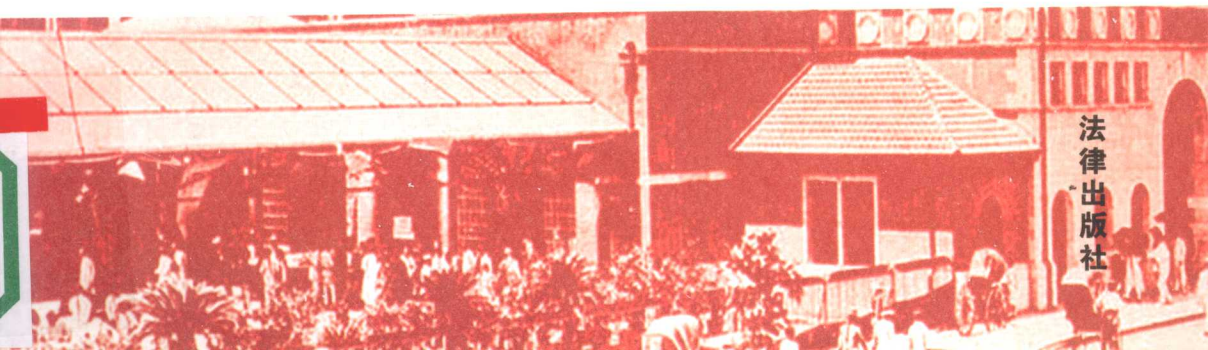


# 观念史研究

金观涛 刘青峰 著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汇集了金观涛、刘青峰十年来在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支持下完成的主要成果。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变迁方式。

## 观念史研究

ISBN 978-7-5118-0133-3



9 787511 801333 >

定价：6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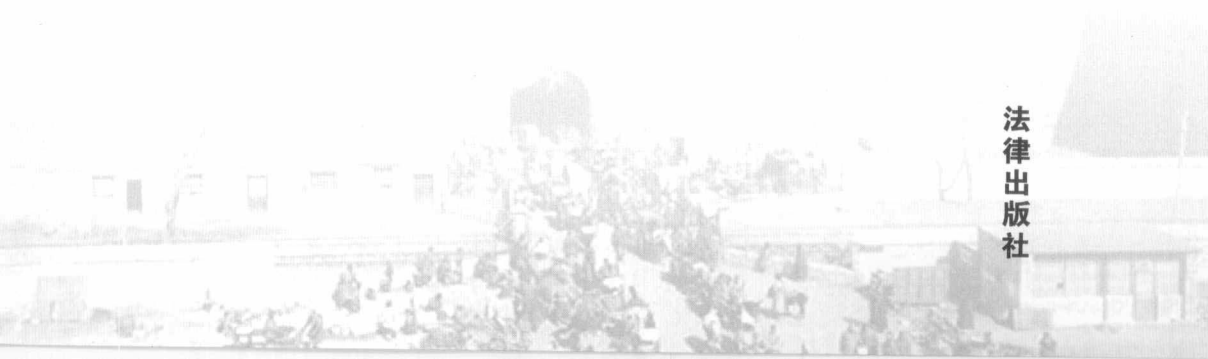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 思想史·政治哲学

#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金观涛  
刘青峰  
著

法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 金观涛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18-0133-3

I. ①观… II. ①金…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②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D0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9757 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易明群 高山

装帧设计/乔智炜

出版/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外文印刷厂

编辑统筹/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吕亚莉

开本/787×960毫米 1/16  
版本/2009年12月第1版

印张/41.75 字数/689千  
印次/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0133-3

定价:69.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序

为本书简体字版写序,说来多少有点儿怪异的感觉,不由想起我们另一本简体字版著作的往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问题与方法集》。这本书是该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组稿并编辑的,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只有十个字的短序:“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老友马嵩山病故时,终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住就是二十年,去年9月又来到台湾。在这二十年中,我们的学术著述都是以繁体字刊行的。在我们为时已算不短的学术生涯中,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文革结束后,在出版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2000年先后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840-1956)》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这两本书在追寻老问题时,转向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的转型,再深入到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从1997年起,我们的研究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在这一研究转向中,同样是自觉地摸索新方法。本书就是我们近十多年来探索的结集。

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研究,采用了我们简单概括为“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的研究,使得近年来经常

被概念史引用的柯林武德那句名言“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变成了“历史沉淀于词汇”。换言之，关键词的语义变化如同 DNA 和 RNA 分析揭示生物遗传历程那样使我们抓往思想变化的痕迹，而计算机数据库为这一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从来学术新观点的提出与工具和方法的创新紧密相关，而新方法的引进令学术研究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因此，本书中大至从观念史角度提出的对中国一百五十年分期的新见解，小至对个别词汇的解剖，也都是未完成式的，需要不断地接受挑战和验证。

去年六月香港出版本书时，我们认为没有多少人会对这本咬文嚼字的厚书有兴趣，只印了数百本。令我们意外的是，出版约一年又重印了，韩国翰林大学翻译本书的韩文版很快也将面世。本书简体字版，如果没有我们 1980 年代的老友严搏非先生——如同马嵩山先生一样热心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位上海出版人——坚持不懈的推介，没有法律出版社对本书的兴趣与认真编辑，这本书的简体字版也不会出来。

最后，也许读者有兴趣了解，“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这一支配我们学术探索的背后又是什么？这就是思想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坚持。大约四百年前的一位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瘟疫染病中写下对人的思考，他说：“人是一个世界，也有自身的造物，人自身的造物是人的思想，思想生来就了不起。”因此，人的尊严，也就是思想的尊严。

金观涛 刘青峰

2009 年 12 月 10 日于台北木栅

# 致 谢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我们感慨万千。虽然,这是十年来我们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下简称“数据库”)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观念演变的主要论文的汇编,但是,正如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的那样,这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研究经费的持续投入,如果没有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的共同努力,本书的结集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以下的感谢,篇幅虽然已经相当长,但仍可能有缺漏。

首先,要感谢资助如下一系列研究计划的机构:1997年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CUHK4001/97H)”;2000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的:“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 1736-1927(RG018-D-99)”;200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资助的:“Data Mining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2002年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1840-1915)(CUHK4006/02H)”;2004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的:“Confucian Traditions and Politic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Study(RG019-P-03)”;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 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2004-2005)资助的:“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Ideas(1840-

1924)”;特别是2006年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为期两年的：“A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Ev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1830-1924)(CUHK4554/06H)”，本书可以说是这项研究计划的最后成果。这几个研究计划均由金观涛担任研究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刘青峰作为主要合作者；此外，先后参与这几个课题的合作者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台湾地区“国立”暨南大学周昌龙教授、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寿安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森时彦教授以及韩国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在此，我们要再次感谢上述资助机构的持续资助和合作者的无私奉献。

1997年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后，我们旋即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组成研究小组，展开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我们选择了新文化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团体或政党的十二种杂志，按统一规格，对每个期刊作出规范性意义分析。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担任期刊研究的人员包括：张谦《甲寅》，孙青《新潮》，唐云松《每周评论》，汪乾明《向导周报》，章红《建设》，黎建军《星期评论》，金燕《少年中国》，赵文斌《努力周报》，孙青、曲伟《现代评论》，楚永全《解放与改造》，苑学武《醒狮》；在香港中文大学，则是由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戚立煌先生和吴嘉仪小姐承担《新青年》的分析。在这一阶段，除周成海先生、屈大成先生曾短期参加过查证文献外，黄庭钰小姐继吴嘉仪小姐成为得力的研究助理。除了感谢以上所有早期参与研究计划的人员外，还特别要说一下戚立煌先生。戚先生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文史研究工作，退休后来到了香港，主动申请参与我们的研究计划。当时，“数据库”尚未建或初建尚未可使用，他以深厚的文史功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带领研究小组中的年轻同事，用传统方法一丝不苟地分析例句。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差不多每种关于《新青年》的分析统计，都是由他作出的。2005年，近七十岁的戚先生依然是中大篮球队的活跃成员，但却因一次医疗事故而去世，令我们深感意外和痛心。

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后，我们意识到，基于个别研究者的分析，研究结果总是会出现个体性差异。为了使观念史研究有更可靠的基础，我们意识到必须要依靠全文录入电子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因此，必须建立计算机数据库。2001年初，刘青峰开始策划建立“数据库”；当时，我们尚不清楚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十分幸运，我们在以下三方面都得到富有成效的支持与配合。

先说系统设计。2001年决定建立“数据库”时，恰好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者



孟大志教授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参与古文献电子计划，“数据库”最早的设计构思就是与他商议决定的；他的学生张丙奇先生和陆薇小姐则承担了编写程序的工作。由于当时估计“数据库”所收文献最多不过是几千万字，到2003年，这一初始设计就很不适用了，查询速度和文献导入都出现问题，系统设计遂成为计划实施的瓶颈。恰好，这年夏天我们结识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年轻的黄勇和黄磊兄弟。从那时至今，黄勇先生就成为“数据库”系统的总设计师。黄勇先生有丰富的计算机应用程序设计经验，但要了解并按照史学研究者的需要来编程，对他来说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从那时起，黄勇先生负责重新设计并不断改进系统的各项功能，以及解决系统运作中发生的各种故障。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计算机技术员李洁儿小姐，也在系统设计的各个阶段，一直热情协助我们解决技术沟通、测试等问题，默默作出奉献。

再说入库文献的选择。1999年夏，吴通福先生作为金观涛和中文大学哲学系合带的博士研究生来到中大。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他是一个极之少见的、自小就熟读传统经典并对明清儒学文献十分熟悉的年轻人。2001年建库工程启动后，由通福负责文献收集和标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决定第一批约七百万字入库文献目录时，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和姜义华教授也分别提供了宝贵意见。2002年通福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又留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两年，担任研究助理和博士后研究员。2004年夏，吴通福博士到江西财经大学就任教职，仍继续参与文献收集和分析工作。也就是在这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我们结识了鱼宏亮博士。鱼博士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修读古代文献专业的，令我们意外的是，一般说来，选择这一专业的人不会对高科技感兴趣，但鱼博士恰恰是一个例外。2004年夏天起，宏亮以他在古文献和计算机数据库两方面的知识，参与建库工程，成为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负责文献与系统管理两方面的工作。在黄勇与宏亮的很好配合下，系统功能作出两次大幅度改进。

在建库工程中，除了系统设计和文献收集处理外，还有大量琐碎繁杂的行政事务，如与分散在不同城市的合作者或机构、公司之间签订并履行合约，保持日常联络，大量来往数据、图片文档的收发验收及管理，课题报告的准备和总结等。这些事务，先后由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黄庭钰小姐、陈美真小姐、叶子菁小姐担当管理。她们的敬业和认真细心的工作态度，保证了建库工程的顺利进行。此外，林立伟先生以他良好的中英文训练，协助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增田真结子小姐曾协助日籍文献的调研；林翠盈小姐、陈露君小姐则在文秘方面作出支援。除叶子菁小姐至

今仍担任“数据库”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外，我们没有忘记并感谢以上几位已先后转职的同事。

2006年9月，最新一个研究计划展开之时，我们就决定利用扩大至一亿两千万字的“数据库”来验证并重新检视早期和中期发表的论文；同时还要运用“数据库”，对我们已做过的中国近现代十大观念研究所涉及的近一百个政治术语做一简单整理。这两项工作，不仅是出于完成本课题的需要，也是用我们初步总结出的方法论，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验证。一年来，高超群先生和鱼宏亮博士与我们组成研究小组，投入了这一艰巨的挑战。超群负责做例句分析和统计，他每天要面对并处理从“数据库”中提取的数千甚或上万条含关键词的例句；宏亮除了日常文献和系统管理工作外，每当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利用“数据库”或从原始文献中查找解决。他们日复一日地从事这种枯燥、但又是最基本的分析整理数据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改写这些论文。与此同时，超群还完成了九十余个相关政治术语词意分析的编写，作为本书的附录二。

最后，本书的编辑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几位同事。由于本书涉及的文献量相当大，图表也很多，校对、编辑和排版工作量就非同一般文章了。每当我们改定一篇文稿，就由朱敏翎小姐、张志伟先生细心编辑，再由张素芬女士一丝不苟地排版制图。用这种流水作业方式，他们在编辑《二十一世纪》每期稿件之余，完成了本书的编排。因此，可以说，本书不仅是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时期与合作者的研究心得，也同时凝结着我们对先后与我们共事的同事之间相处的美好记忆。

金观涛、刘青峰

2008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 目 录

致谢 / 1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 1

## 上篇：理论探索

- 一 “天理”、“公理”和“真理” / 27  
——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
- 二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 / 71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

## 中篇：观念变迁和术语

- 三 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 / 103
- 四 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 / 151
- 五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 / 180  
——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 六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 / 226  
——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 七 从“共和”到“民主” / 252  
——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
- 八 从“富强”、“经世”到“经济” / 289  
——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
- 九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 / 325  
——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 十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 / 365

## 下篇：方法论

- 十一 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 / 403  
——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 十二 “科举”和“科学” / 421  
——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
- 十三 历史的真实性 / 434  
——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 附录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 / 474
- 附录二 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 / 489
- 附录三 有关统计分析的讨论 / 617
- 附录四 导论及各篇文章的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 622
- 参考书目 / 636

# 图表目录

图 1.1	“公理”、“公例”的使用次数(1860 ~ 1915)	56
图 1.2	“公理”+“公例”及“真理”的使用次数(1860 ~ 1930)	64
图 2.1	“国民”、“个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涌现(1898 ~ 1915)	84/619
图 2.2	“经济”、“立宪”和“共和”的使用次数(1860 ~ 1915)	88
图 3.1	“权”、“权利”的使用次数(1864 ~ 1915)	116
图 3.2	“利权”、“权利”的使用次数(1864 ~ 1915)	119
图 3.3	“权利”、“个人”的使用次数(1864 ~ 1915)	132
图 3.4	“权利”、“义务”的使用次数(1864 ~ 1915)	135
图 3.5	《新青年》中个人、群体和国家“权利”的使用次数	147
图 5.1	“群”、“社会”的使用次数(1860 ~ 1915)	197
图 5.2	清末知识分子政治性社团成立年代分布(1895 ~ 1911)	211
图 6.1	“天下”、“民族”和“国家”的使用次数(1860 ~ 1915)	242
图 6.2	“万国”、“世界”和“国际”的使用次数(1860 ~ 1915)	246
图 6.3	“世界”、“世纪”的使用次数(1860 ~ 1915)	249
图 7.1	“民主”、“民政”的使用次数(1864 ~ 1915)	263
图 7.2	“民主”、“共和”的使用次数(1864 ~ 1925)	269
图 7.3	《新青年》中“共和”、“民主”的使用次数	279
图 7.4	《新青年》中“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的使用次数	285
图 8.1	“富强”、“经世”和“经济”的使用次数(1860 ~ 1915)	305
图 8.2	《新青年》中“经济”、“社会”、“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	

的使用次数 .....	316
图 9.1 “博物”、“格致”的使用次数(1860 ~ 1895) .....	335
图 9.2 “科学”取代“格致”的历程(1894 ~ 1915) .....	341
图 9.3 《新青年》中“技术”、“制造”、“工业”和“生产力”的使用次数 .....	363
图 10.1 “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结构 .....	367
图 10.2 “革命”及“维新”(含“改革”、“改良”)的使用次数(1890 ~ 1926) .....	382
图 10.3 “革命”、“平等”和“独立”的使用次数(1890 ~ 1927) .....	386
图 11.1 《新青年》中“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华盛顿会议”和“巴黎和会”的使用次数 .....	410
图 12.1 “学校”、“学堂”的使用次数(1860 ~ 1924) .....	429
图 13.1 客体不能独立于主体存在时的主客观关系 .....	437
附录三图 “国民”、“个人”各年万字中的使用次数(1898 ~ 1915) .....	620
表 1.1 汉代和汉代以前文献中“理”字的典型用法 .....	33
表 1.2 汉代和汉代以前文献中“理”字的意义分类统计 .....	36
表 1.3 《庄子注》和《四书章句集注》中“理”字的用法 .....	39
表 1.4 《佐治刍言》中“理”字的用法 .....	46
表 1.5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公理”的意义分类统计 .....	59
表 1.6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公例”的意义分类统计 .....	60
表 1.7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真理”的意义分类统计 .....	63
表 1.8 《新青年》等五种杂志中“理性”的意义分类统计 .....	67
表 2.1 自汉至清中叶十三种文献中“公”字的不同含义及使用次数 .....	79
表 3.1 道德化程度及其相应的观念和观念系统 .....	110
表 3.2 《盐铁论》中“权利”的用法 .....	111
表 3.3 《万国公法》中“权利”的用法 .....	113
表 3.4 “权利”、“利权”的用法(1883 ~ 1900) .....	117
表 3.5 “权利”的用法(1901 ~ 1911) .....	124
表 3.6 《新青年》中“权利”的意义 .....	139
表 4.1 “个人”的意义分类统计(1898 ~ 1915) .....	150
表 4.2 “个人”、“国民”和“个人主义”的用法(1900 ~ 1915) .....	152
表 4.3 《新青年》中“个人”的意义分类统计 .....	171

表 5.1	“群”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 .....	190
表 5.2	“群”在古代文献中的意义分类统计 .....	192
表 5.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群”、“社会”的用法 (1901 ~ 1904) .....	198
表 5.4	《新青年》中“社会”、“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 .....	219
表 5.5	《新青年》中“社会主义”的词义类别及评价 .....	220
表 7.1	“民主”的意义分类统计(1864 ~ 1915) .....	259
表 7.2	《新青年》中“民主”及其相关词汇的意义分类统计 .....	284
表 7.3	《新青年》作者使用“民主”及其相关词汇时的价值取向 .....	286
表 8.1	四种清代经世文编中“自强”、“富强”、“经济”和“生计”的使用 次数及典型例句 .....	300
表 8.2	《新青年》中“经济”的意义分类统计 .....	314
表 9.1	1910 年梁启超对“常识”和“专门学识”的区分 .....	346
表 9.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常识”的用法 .....	350
表 9.3	《新青年》中“常识”的用法 .....	351
表 9.4	《新青年》中“科学”的词意变化 .....	360
表 10.1	二十五史和十三经中“革命”的用法举隅 .....	368
表 10.2	“革命”的意义分类统计(1896 ~ 1911) .....	374
表 10.3	《新青年》中“革命”的意义分类统计 .....	390
表 11.1	《新青年》中所提及的十一项大事 .....	409
附录三表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 ~ 1930)各年文献字数 .....	621

#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 转向观念史？

如果思想史需要接受经验的检验，那么便只能以观念史作为自己的基础。什么是观念？观念史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本书力图通过对中国当代观念形成的考察来表达如下信念：我们正在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

## 一 破碎的万花筒：中国当代思想之谜

今天中国人有一种不知往何处去的文化迷惘，造成文化失落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要理解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就必须去研究其形成过程。然而，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却在于：它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今日盛行的价值系统，本是建立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及其退潮之上；而80年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则源于对20世纪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它又是1970年代毛泽东思想解构的结果。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今天的年轻人，对爷爷辈经历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的痛苦，对父辈经历阶级斗争和“文革”后的沉痛反思，已毫无感觉。大多数年轻人或满足于专业追求，或沉浸在消费社会中寻求刺激，再



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确实,当一个庞大、长期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体系解体时,在社会对思想的普遍冷漠中,人们已没有兴趣去关注思想文化如何暗中变迁及其整体结构瓦解后的残存形态。

对于上述过程,思想史研究者常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而我们则更喜欢用打烂的万花筒作比喻。儿童时看万花筒,每转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图案;如果打碎万花筒,倒出来的是一堆有色碎片。当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时,正如巨型万花筒在转动,图景气象万千,不断组合出魅力世界。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正如万花筒被打碎,魅力世界消失了,人们对价值理念完全失去兴趣。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却必须去考察万花筒中的景象是如何出现的。万花筒中的图像虽然有趣,却是由一些固定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没有这些碎片,就不可能建构意识形态,亦不会发生意识形态的迅速变迁。要理解革命意识形态解体后的思想形态,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建构和解构,仍然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思想碎片。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确实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瓦解后的思想碎片不仅存在,而且其形态是相当稳定的,只是人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罢了。它们就是当代中国人用于理解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基本观念。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建构了20世纪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1920年代以后指导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而意识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基本观念的消失。举几个例子。“告别革命”的说法,只不过反映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革命意识形态解构的结果);但革命观念(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本身,在今日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差别并不大。其他中国人熟悉的观念,如个人、权利、社会等,也不是如此么?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以科学观念来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变化的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